

数字政府驱动全球社会创业： 制度分析与经验证据^{*}

宋程成 赵陈芳 康姣姣 吕孟丽^{**}

【摘要】 数字政府建设不仅意味着政府治理的自我变革，还引起了国家与社会、经济间接接触界面的重构。探讨数字政府之于社会创业的影响，不但有助于理解政府数字化建设的社会价值，亦可以把握社会创业所处制度环境的深刻变革。全球层面数据分析表明：数字政府建设不仅有助于提高社会创业水平，还可以抑制传统文化（集体主义倾向、不确定性规避）之于社会创业的负面效应。可见，政府所塑造的制度构型对于社会创业有着重要影响，社会创业者不仅需要关注政府出台的具体政策，还应考察数字政府建设带来的潜在契机。

【关键词】 国际比较；多层次模型；社会创业；政府作用；制度构型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数字平台对慈善事业的影响机制及其治理研究”、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一般项目“社会组织参与超大城市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研究”（2024BJC015）的阶段性成果。

** 宋程成，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青年研究员；赵陈芳（通讯作者），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讲师；康姣姣，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吕孟丽，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 引言

社会创业是指发现、定义和利用机会以增加社会价值的创业活动和过程 (Zahra et al., 2009)。全球创业观察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GEM) 的报告数据显示, 在世界范围内, 社会创业在早期创业活动 (Total Early-stage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TEA) 中所占的比例已经从 2009 年的 2.8% 增长到 2015 年的 3.7%; 同时, 该报告认为, 由于社会创业强调利用市场化、商业化手段来化解特定社会问题 (如贫困、犯罪、教育及环保等), 故而人们试图借助这一创业形态来应对市场、政府和慈善的失灵。

社会创业在实践层面的快速发展激发了学者们的研究兴趣。目前, 该议题已构成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并且为制度分析、公共政策以及创业等领域的学者所重视。遗憾的是, 针对这一特殊创业形态的研究, 多集中于社会创业属性 (相对商业创业而言)、社会创业动机、创业过程以及创业结果等内容 (刘振等, 2015; Gupta et al., 2020; Saebi et al., 2019), 关于社会创业产生的宏观动力机制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仍有待加强。此外, 大部分文献集中于概念辨析和定性分析, 具有代表性的量化研究相对不足 (刘志阳、庄欣荷, 2018)。

当前社会创业发展动力机制文献的基本共识是: 政府在社会创业发展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在实践中, 越来越多的政策制定者尝试将社会创业视为应对社会挑战的新颖方式、缓解政府福利预算压力的工具和政府干预的替代性手段 (Guo & Bielefeld, 2014; Choi & Park, 2021)。一般而言, 政府既可以通过出台各类认证方案和政策来刺激社会创业, 也可以通过规范约束和生态建构来引导社会创业的成长方向 (邓国胜等, 2019)。近年来, 世界各地政府也在进行着一场自我数字化变革, 这一革新旨在借助数字基础设施的重塑以实现民主参与、公共服务以及权力共享等方面的目标 (张晓、鲍静, 2018)。目前来看, 数字政府建设对社会创业的系统性影响, 可能并不亚于以往研究所强调的政策支持和法治环境等因素。

已有研究讨论了数字政府在促进社会质量、政治治理以及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信息功能 (Choi & Park, 2021; 杨晶等, 2020); 同时, 亦有学者从制度环境特别是政策角度, 分析了政府对社会创业的促进作用 (刘志阳、许莉萍,

2022)。但上述文献均未能详细探讨政府数字化变革之于社会创业的系统性影响 (Shockley & Frank, 2011)。导致上述问题悬而未决的原因是可用于进行整体性检验的统计数据的缺乏。目前, 仅有 GEM 于 2015 年专门出版了社会创业的研究报告。这一报告显示, 在不同类型的经济体中社会创业的比例会随着特定经济体自身政治经济状况而呈现出巨大的差异性, 这为后续分析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启示。

为此, 本研究将探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数字政府建设对于社会创业的可能影响机理和具体路径, 并在梳理实证结果的理论价值基础上, 着力思考上述发现对于中国国内社会创业的借鉴意义。

二 数字政府建设与社会创业：理论与假设

(一) 理论基础：社会创业中的制度理论

在过去十多年中, 制度理论构成了社会创业和社会企业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 并为学者们思考社会创业得以发生的制度约束与机遇提供了分析框架 (Li & Bosma, 2024)。Austin 等强调, 作为跨部门的创新性活动, 社会创业的绩效会受到政府等众多利益相关者的影响 (Austin et al., 2006)。例如, 政府政策可能存在一定的脆弱性, 这会提高社会创业目标偏离的概率, 还可能放大社会企业商业化与使命漂移之间的正向关系 (邓国胜等, 2019)。

进一步地, 政府之于社会创业的影响在经验上呈现出极大的多元性。制度逻辑视角强调, 制度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能够组合、兼容或抵消, 进而导致经验结果的模糊性: 一是不同制度要素间存在矛盾效应, 例如, 政府行动主义与后唯物主义对于个体社会创业参与的作用方向往往是相反的 (Estrin et al., 2016; Hechavarría, 2016); 二是不同制度的组合会减弱单一制度的抑制作用, 例如, 随着环境不确定性程度的增加, 国家和市场两种制度的结合会趋于促进社会创业 (Mair & Marti, 2009); 三是两种制度存在互补效应, 有研究发现政府行动主义与社会文化支持的结合会提高特定的个体参与社会创业的可能性 (Hechavarría et al., 2017)。

为有效梳理不同制度要素与社会创业的内在关系并建立起统一的解释框架, Stephan 等学者创造性地提出了制度构型观 (Institutional Configuration) 来分析

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对社会创业的单和组合影响 (Stephan et al., 2014)。其中, 制度构型是指正式 (如政府支持、政府行动主义等) 与非正式制度 (如传统文化、社会网络等) 以某种形式组合。制度构型观强调将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统一分析会更具解释力 (Stephan et al., 2014; Bruton et al., 2010), 并且有可能对社会创业领域对立的经验发现进行弥合: 首先, 文化因素可以填补某些“制度空白” (Short et al., 2009), 例如在缺乏完善法律规范的情况下, 非正式规范会在促进信任方面提供替代性的功能, 所以法治缺失可能会增加社会创业对社会资本、文化规范以及社会价值观等非正式制度的依赖 (Yan et al., 2018)。其次, 正式制度的完善也会影响非正式制度的作用, 从而对创业者基本活动产生影响 (Sahasranamam & Nandakumar, 2020), 例如中国改革开放促进了部分地区商业文化重新繁荣, 改变了人们的行为认知并且促进了 (社会) 创业活动产生 (Bhatt et al., 2019)。最后, 在跨国分析中, 价值观往往被认为是最关键的非正式因素 (Hofstede, 1980; House et al., 2004), 因此, 除了探讨数字政府对于社会创业的直接影响外, 还应当重点考虑其与文化价值观 (如集体主义、风险偏好等) 间的制度构型对社会创业的可能影响。

(二) 研究假设

1. 数字政府之于社会创业的促进作用

以往关于政府与社会创业间关系的文献大致有三点启示: (1) 政府自身运行的官僚成本和经济活动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或抑制 (社会) 创业 (Fogel et al., 2006; Williamson, 2000); (2) 政府可能是社会创业的重要推进方, 其所提供的相关政策和资金扶持是社会创业发展的重要前提 (李健, 2016; Choi et al., 2020; Choi & Park, 2021); (3) 政府不仅会直接影响到社会创业, 其对于自身的制度和技术建设可能会影响到其他因素对社会创业的作用方式 (Estrin & Mickiewicz, 2012; Shockley & Frank, 2011; Kerlin, 2010)。

随着数智时代到来, 各国政府也在进行着一场内部自我革新, 这一变革趋势是否会对社会创业活动产生系统性影响是需要深入考察的。例如, 数字政府建设本身就会创造一定的就业机会和空间 (Lee et al., 2011), 有助于促进商业活动和创业行为 (Epstein et al., 2014; He et al., 2022; McLoughlin & Wilson, 2013)。同时, 数字政府 (电子政务) 建设也有助于社会企业的发展 and 壮大 (Chatak et al., 2020): 除了减少社会运行成本、降低模糊性和提升公民参与度

等作用外，数字政府提供了一种“平台”机制，为公民开展包括社会创业在内的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多机会（张晓、鲍静，2018）。

具体来说，数字政府及其建构的正式制度将会确保社会创业者进入与退出的便利性（Saebi et al. , 2019；Choi & Park, 2021；OECD & European Union, 2017），有利于激活社会创业所需的资源并且提高个体开展社会创业活动的可能性（Sahasranamam & Nandakumar, 2020）。如前所述，数字化的价值不仅在于政府自身组织方式变化和内部流程再造，还意味着更加高效廉洁的运行、更快的审批速度和对社会需求的及时回应与支持。可见，数字政府建设可被视为一种国家内外部正式制度的完善过程（张晓、鲍静，2018），进而更好地撬动社会部门中的资源和需求，推动个体参与社会创业：一方面，政府自身运行管理成本的降低和服务环境的改善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创业；另一方面，数字政府作为基础性设施，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和创业成本，从而提高和促进个体社会创业的意向和行动（McLoughlin & Wilson, 2013）。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

H1：数字政府建设会促进社会创业，即数字政府与社会创业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2. 数字政府之于非正式制度（文化价值观）负面效应的调节

非正式制度大致包含了文化价值观、宗教信仰、地区社会关系等内容，这些要素主要是从组织逻辑以及个体行为与心智模式等方面影响社会创业（Stephan & Uhlaner, 2010）。例如，宏观的社会支持文化规范、集体主义价值观、社会信任以及性别平等价值观等因素会促进个体间的互动和合作，显著提高个体参与社会创业的可能性，从而激活社会创业活力（Fukuyama, 2001；Li & Zahra, 2012；Pathak & Muralidharan, 2016）。进一步地，在主流的跨国分析中价值观因素往往被视为非正式制度的关键代理（Hofstede et al. , 2010；Hofstede, 1980；House et al. , 2004）；“不确定性规避”和“个体主义/集体主义导向”这两个文化价值观则被认为是影响某个国家/地区社会创业活动或者意愿的关键因素（Stephan & Uhlaner, 2010；Gorodnichenko & Roland, 2017；Thai & Turkina, 2014）。

一般情况下，在不确定性规避较高的社会之中，社会创业行为往往会受到

抑制 (Desa & Basu, 2013), 这是由于潜在的社会创业者对于风险的感知会降低其创业预期, 从而降低这些人员社会创业参与的可能性。换言之, 不确定性规避会导致社会创业意愿的减弱和社会创业活动的减少 (Shockley & Frank, 2011)。

由于文化要素的相对稳定性, 改变上述局面的关键在于正式制度的变革。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情况下, 正式制度变革在很大程度上会促进社会创业环境改善 (如信息和知识的获取成本的降低) (Kerlin, 2017) ——正式制度的改变会重新塑造社会创业的外部生态, 进而影响到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发挥 (Woo & Jung, 2022)。从实践角度看, 数字政府建设恰好是正式制度变革的重要表现。数字政府建设在相当程度上完善了营商环境, 提高了服务效率, 这就降低了创业环境中的信息不对称和创业者对于风险的预估, 从而使得原有文化中的不确定性规避对于社会创业行为的抑制效应被缓解 (McMullen, 2018)。因此, 本文提出假设 2:

H2: 数字政府建设将负向调节特定社会中不确定性规避态度对于社会创业的抑制作用。

现有研究也发现, 集体/个体主义倾向会对社会创业行为和意图产生系统性影响 (Kerlin, 2017; Woo & Jung, 2022)。一般认为, 偏集体主义的文化会抑制社会创业活动 (Schmutzler et al., 2019; Desa & Basu, 2013), 这是由于集体主义社会中冒险性行为更加难以获得认同, 人们为了保持与外部一致, 会尽量去做一些更具有合法性的活动 (Sud et al., 2009); 但是, 也有一些经验研究发现, 组内集体主义有可能会同时促进社会创业 (Pathak & Muralidharan, 2016)。不过, 考虑到大部分社会创业发生在文化上偏向个人主义且经济富足的西方社会 (Brieger et al., 2021; Sud et al., 2009), 本研究偏向于强调集体主义会抑制社会创业 (Bosma et al., 2016)。

尽管集体主义价值观较为稳定, 但是政府也可以通过正式制度重塑来改变社会创业的合法性获取, 例如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对基础性生态的塑造可以促进集体主义国家内社会企业的快速成长 (Choi & Park, 2021; Woo & Jung, 2022)。由于数字政府建设使得国家与个体间联系的基础性设施得到加强, 从而

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去中心化”趋势，强化了公民对自身权利和义务的认识。可见，数字政府建设在增强公民权的同时，激发了公民对于自身作为独特个体的价值认同，实现了个体对传统集体主义文化的突破。换言之，数字政府建设可能会削弱集体主义倾向之于社会创业活动的合法性约束（Porcher, 2021）（图 1）。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3：

H3：数字政府建设将负向调节特定社会中集体主义文化对于个体社会创业的抑制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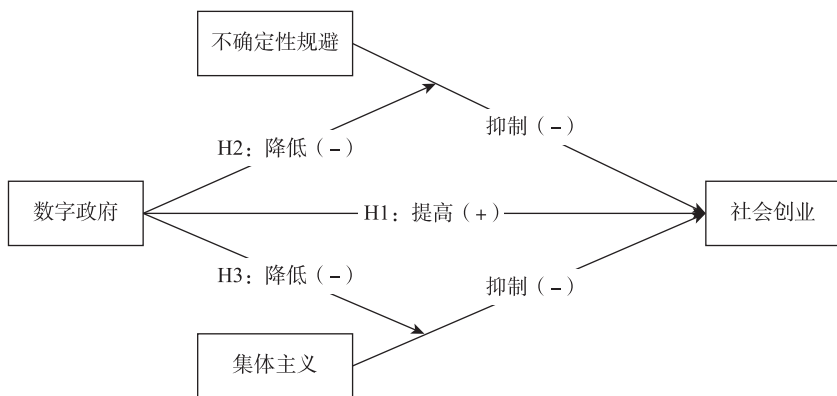


图 1 研究假设示意图

三 研究设计

（一）数据与样本

本研究旨在检验宏观层面的数字政府、不确定性规避和集体主义如何影响个体层面的社会创业活动，在数据获取方面难度较大。为丰富样本差异性，研究的数据来源于多个独立且公开的数据库。其中，国家层面的数据来源于 2014 年世界银行数字采纳指数（World Bank Digital Adoption Index, DAI）、全球领导和组织行为有效性项目（The Global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Effectiveness Program, GLOBE）、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United Nations E-Government Survey）等数据库，个人层面的数据来自 2015 年 GEM 的社会创业专题调查。

GEM 的社会创业活动数据基于 2015 年对 58 个经济体的 167793 名成年人的采访,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创业比较研究数据库。

对上述数据库的匹配,主要结合如下标准进行:(1)剔除数据合并滞后的国家层面缺失的样本(利用 GEM 2015 年社会创业专题调查匹配世界银行 DAI 指数后共 53 个国家,剔除了包括比利时在内的 5 个国家或地区的缺失数据);(2)将样本限制在 18~64 岁的适龄工作成年人,剔除其他年龄段样本;(3)剔除其余极端样本。最终获得 53 个国家和地区内 154541 个样本的嵌套数据,样本涵盖了欧洲(23 个)、亚洲(9 个)、非洲(7 个)、南美洲(12 个)、北美洲(1 个)、大洋洲(1 个)等区域,具有广泛的地区差异。其中,个人层面数据相较于国家而言滞后一期,用于减少变量之间的反向因果。

(二) 变量与测量

1. 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社会创业参与,来源于全球创业观察社会创业专题中的“是否参与到运营性的社会创业活动中”(SEA_OPERAT)这一题项,为虚拟变量;同时,还有一个对应题项为“是否参与到新创的社会创业活动中”(SEA_NASCENT)(Bosma et al., 2016)。由于文章关注的是宏观制度层面的影响机制,运营一段时间的社会创业要比新创社会创业更有可能捕捉到数字政府的作用,因此选择前者作为因变量的测量题项。

2. 自变量、调节变量与被调节变量

自变量/调节变量:自变量/调节变量数字政府的测度源于 2014 年世界银行数字采纳指数中的数字政府指数(Digital Adoption by Governments)。数字采纳指数是一个综合指数,用于衡量数字技术在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的传播程度。世界银行出版的《2016 年世界发展报告:数字红利》为数字采纳指数提供了分析基础。数字采纳指数有两个优势。首先,它反映了一个经济体中所有关键主体:个人、企业(公司)和政府可获得与采用数字技术的程度。因此,它比现有的其他指数提供了更全面的技术扩散情况。其次,DAI 是利用覆盖和使用方面的数据构建的,这些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内部数据库,比基于认知调查的数据更加稳健和客观。其中,数字政府指数(DAI-g)是通过计算核心行政系统(Core Administrative Systems)、在线公共服务(Online Public Services)和数字身份(Digital Identification)三个子指数的平均值得出的综合指标。在线公共服务数

据由联合国在线服务指数提供，核心行政系统和数字身份的数据源于世界银行的数据库（World Bank，2016）。

被调节变量：不确定性规避的概念源于全球领导和组织行为有效性项目，描述了一个社会、组织或团体依靠社会规范、规则和程序来减少对未来事件不确定性的程度。人们越是希望避免不确定性，就越是寻求秩序、一致性、结构、正式程序和法律来覆盖日常生活。具体而言，不确定性规避数值是通过测量“我认为应该强调有序和一致性，即使牺牲实践和创新”等五个题项的总得分获得的（House et al.，2004）。

集体主义同样源于全球领导和组织行为有效性项目，指个人在组织或家庭中表达（或应该表达）自豪感、忠诚和凝聚力的程度，由于这一项目强调跨国比较，这一概念主要是基于国家（或社会总体）层面进行测度的。具体是通过计算“孩子们应该为父母的个人成就感到骄傲”“对你们社会的成员来说，你们的社会被其他社会的人积极看待”等五个题项的总得分获得的（House et al.，2004）。

3. 控制变量

研究控制了个体和国家两个层面的相关变量。在个人层面，控制了性别、年龄、年龄的平方、教育水平、收入等因素。此外，还控制了影响社会创业参与的个体技能、社会资本、对失败的恐惧等变量（Canestrino et al.，2020）。在国家层面，控制了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政府支出等因素的影响。

为了消除量纲差异带来的影响，提升回归系数的可解释性并减少多重共线性问题，对解释变量、调节变量以及控制变量中的连续变量均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即将变量值减去样本均值后除以样本标准差，使得变换后的变量均值为0，方差为1。进一步地，在构建数字政府与不确定性规避、集体主义的交互项时，也是用标准化后的变量值（表1）。

表1 变量定义及测量方式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测量方式	数据来源	变量层次
因变量	社会创业参与	是否参与到运营性的社会创业活动中，是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GEM	个体

续表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测量方式	数据来源	变量层次
自变量/调节变量、被调节变量	数字政府	根据数字采纳指数 (DAI) 中不同国别的数字政府指数计算	World Bank	社会
	不确定性规避	根据不同国别的不确定性规避社会价值量表得分计算	GLOBE	社会
	集体主义	根据不同国别的集体主义社会价值量表得分计算	GLOBE	社会
控制变量	性别	女性赋值为 0, 男性赋值为 1	GEM	个体
	年龄	受访者报告的年龄	GEM	个体
	年龄平方	受访者报告的年龄的平方	GEM	个体
	教育水平	按照联合国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分为 5 个等级	GEM	个体
	收入	GEM 将受访者的收入从高到低分为三个层次, 包括高收入 (前 33%)、中等收入 (中间 33%) 和低收入 (后 33%), 主要采用人均收入测度	GEM	个体
	个体技能	虚拟变量: 具备开始新业务所需的知识、技能和经验为 1, 否则为 0	GEM	个体
	社会资本	虚拟变量: 认识过去两年创业的人为 1, 否则为 0	GEM	个体
	失败恐惧	虚拟变量: 对失败的恐惧会阻止创业为 1, 否则为 0	GEM	个体
	GDP 增长率	各国标准化的 GDP 增长率	GEM	社会
	失业率	各国的失业率数值	GEM	社会
政府支出	各国的政府支出值 (标准化)	World Bank	社会	

(三) 描述性统计

表 2 显示了样本基本情况。其中, 在参与调查的国家中, 数字政府的平均得分为 0.684, 且大部分国家得分高于 0.5, 表明数字政府在许多国家得到了认可且处于不断发展进步过程中。同时, 数字政府和社会创业参与之间的相关关系为正 ($r=0.019, p<0.001$), 不确定性规避和集体主义与社会创业参与之间的相关关系为负 ($r=-0.089, p<0.001$; $r=-0.093, p<0.001$)。

四 实证检验

（一）回归分析

研究采用了多层混合效应 logit（逻辑）回归来检验假设（Hox et al., 2010）。由于个体数据嵌入国家数据中，因此多层混合模型比传统的回归模型更具优势。首先，多层线性模型充分考虑到了个体和国家数据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忽略这种相互依赖关系的传统回归模型可能会导致回归系数、标准差和置信区间的偏差；其次，多层次模型可以提供多个层面上的系统分析以及跨层次的交互作用，有利于分析创业决策的依赖性。为确定是否需要使用多层模型，对因变量运行一个仅拦截模型并计算了类内相关系数（ICC：国家间存在的各自因变量中总方差的百分比），估计了因变量在国家层面的方差。这一统计方法与其他多层次创业研究遵循的方法一致（Hofmann, 1997）。结果显示，大约 35.03% 的社会创业参与的差异性存在于国家间（ICC 系数分为小、中、大三种，分别为 0.05、0.10 和 0.15）（Hoetker, 2007），表明有相当大的国家间差异需要分析，应当使用多层混合 logit 回归。上述模型选择策略与以往研究的思路也是一致的。例如，Liu 等（2024）对宏观层面的亲市场制度对社会创业的影响进行了考察；王博与朱沅（2020）也剖析了宏观层面的正式制度改善速度与个体机会型创业选择之间的关系。同时，当数字政府作为调节变量时，主要考察其对社会层面自变量（不确定性规避、集体主义）与因变量（个体社会创业）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这与前人关于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构型影响社会创业的研究一脉相承（Kerlin, 2017；Hechavarría et al., 2017；Stephan et al., 2014）。

具体的实证检验过程如下：（1）对数字政府与社会创业参与的关系进行检验；（2）对不确定性规避、集体主义与社会创业参与的关系进行检验；（3）检验数字政府在不确定性规避、集体主义与社会创业参与中的调节效应；（4）对包含所有变量的整体模型进行呈现。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

从表 3 可知，年龄、年龄平方、受教育水平、收入、个体技能、社会资本等个体层面的变量均对社会创业参与有着正向影响，而失败恐惧对社会创业参与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这符合以往文献的相关预期。

表 2 变量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

变量	最小值	最大值	1. 社会创业	2. 数字政府	3. 不确定性规避	4. 集体主义	5. 性别	6. 年龄	7. 年龄平方	8. 教育水平	9. 收入	10. 个体技能	11. 社会资本	12. 失败恐惧	13. GDP 增长率	14. 失业率	15. 政府支出		
1	0.00	1.00	1																
2	-4.57	1.49	0.019***	1															
3	-2.75	1.61	-0.089***	-0.284***	1														
4	-2.15	1.60	-0.093***	0.074***	0.530***	1													
5	-7.00	0.99	-0.016***	-0.00100	0.00400	0.00300	1												
6	-3.09	1.80	0.016***	0.074***	-0.087***	-0.019***	0.014***	1											
7	0.00	9.53	-0.001	-0.040***	-0.022***	-0.032***	0.010***	-0.030***	1										
8	-3.46	1.95	0.087***	-0.063***	-0.157***	-0.186***	-0.015***	-0.107***	-0.080***	1									
9	-0.65	1.65	0.061***	0.005*	-0.056***	-0.087***	-0.076***	0.006**	-0.064***	0.251***	1								
10	-4.27	1.01	0.052***	-0.027***	0.084	0.142***	-0.107***	0.011***	-0.064***	0.077***	0.097***	1							
11	-4.66	1.27	0.061***	-0.035***	0.061***	0.006**	-0.065***	-0.076***	-0.057***	0.091***	0.104***	0.220***	1						
12	-4.18	1.13	-0.022***	0.013***	0.024	0.068***	0.055***	-0.005*	-0.037***	-0.002	-0.015***	-0.030***	0	1					
13	-1.25	1.13	0.034***	-0.366***	-0.064***	-0.091***	0.005**	-0.059***	0.016***	0.155***	0.038***	0.027***	0.021***	0	1				
14	-1.35	2.07	-0.055**	0.334***	0.056**	0.325***	-0.005*	0.081***	-0.011***	-0.111***	-0.104***	-0.006**	-0.058***	0.048***	-0.486***	1			
15	-0.20	5.18	-0.028**	-0.188***	0.216**	0.150***	-0.00100	-0.038***	-0.038***	-0.055***	0.009***	0.062***	0.118***	0.027***	0.187***	-0.179***	1		

注: *表示 $p < 0.10$,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01$ 。

模型 1 就数字政府对于社会创业参与的作用进行了检验, 结果表明, 数字政府会正向影响社会创业参与 ($\beta=0.532, p<0.05$), 假设 1 得到证明。模型 2 和模型 4 对不确定性规避与集体主义的影响进行了检验, 结果表明, 二者均负向影响社会创业参与 ($\beta=-0.850, p<0.001$; $\beta=-0.749, p<0.01$), 这与先前研究的预测相符合。模型 3 就数字政府之于不确定性规避与社会创业参与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进行了检验, 结果表明, 数字政府与不确定性规避的交互项正向影响社会创业参与 ($\beta=0.905, p<0.001$); 类似地, 模型 5 对数字政府之于集体主义与社会创业参与间关系的调节作用进行了检验, 结果表明, 数字政府与集体主义的交互项正向影响社会创业参与 ($\beta=1.075, p<0.001$)。

此外, 在检验交互效应时, 由于自变量的值不同, 交互项的方向及其统计显著性可能会有所不同。因此, 我们将交互结果绘制为不同自变量值的调节变量的高值和低值之间的边际图, 如图 2 所示。模型 3、模型 5 的结果以及调节效应图示均表明, 数字政府显著地减弱了不确定性规避以及集体主义对于社会创业的负向作用, 假设 2、假设 3 得到证明。上述结果在模型 6 显示的全模型中也基本保持了一致。

表 3 多层 logit 回归模型结果

变量	社会创业参与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控制变量						
性别	-0.023 (-1.383)	-0.010 (-0.454)	-0.010 (-0.457)	-0.010 (-0.455)	-0.010 (-0.451)	-0.010 (-0.450)
年龄	0.107*** (6.439)	0.097*** (4.472)	0.097*** (4.474)	0.097*** (4.487)	0.096*** (4.446)	0.096*** (4.436)
年龄平方	0.040** (2.763)	0.017 (0.940)	0.017 (0.952)	0.017 (0.932)	0.017 (0.939)	0.017 (0.943)
受教育水平	0.396*** (18.723)	0.403*** (14.503)	0.403*** (14.510)	0.402*** (14.475)	0.401*** (14.458)	0.401*** (14.460)
收入	0.124*** (7.873)	0.112*** (5.490)	0.112*** (5.481)	0.112*** (5.499)	0.112*** (5.509)	0.112*** (5.495)
个体技能	0.261*** (14.613)	0.261*** (11.649)	0.261*** (11.660)	0.261*** (11.669)	0.262*** (11.695)	0.262*** (11.693)
社会资本	0.297*** (17.615)	0.334*** (15.387)	0.333*** (15.375)	0.333*** (15.368)	0.333*** (15.362)	0.333*** (15.371)

续表

变量	社会创业参与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失败恐惧	-0.097*** (-5.893)	-0.099*** (-4.819)	-0.099*** (-4.815)	-0.099*** (-4.818)	-0.099*** (-4.827)	-0.099*** (-4.821)
GDP 增长率	-0.107 (-0.576)	-0.240 (-0.970)	-0.188 (-0.858)	-0.039 (-0.144)	0.392+ (1.845)	0.178 (0.832)
失业率	-0.270 (-1.044)	-0.191 (-0.639)	-0.202 (-0.765)	-0.075 (-0.223)	-0.113 (-0.425)	-0.141 (-0.585)
政府支出	-0.216 (-0.919)	-0.060 (-0.246)	0.087 (0.402)	-0.127 (-0.471)	0.066 (0.327)	0.106 (0.566)
自变量与调节变量						
数字政府	0.532* (2.515)		0.505+ (1.873)		0.847*** (3.336)	0.666** (2.685)
不确定性规避		-0.850*** (-4.068)	-0.663*** (-3.580)			-0.383* (-2.077)
数字政府× 不确定性规避			0.905*** (3.294)			0.368 (1.284)
集体主义				-0.749** (-3.115)	-0.722*** (-4.027)	-0.458* (-2.388)
数字政府× 集体主义					1.075*** (4.118)	0.752** (2.639)
常数项 (个体)	-4.192*** (-21.326)	-4.525*** (-18.495)	-4.222*** (-19.210)	-4.583*** (-16.832)	-4.558*** (-21.731)	-4.444*** (-21.454)
常数项 (国家)	1.446*** (3.932)	1.520** (3.091)	1.077** (3.126)	1.869** (3.123)	0.960** (3.161)	0.785** (3.141)
N	142394	103269	103269	103269	103269	103269

注: +表示 $p < 0.10$,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0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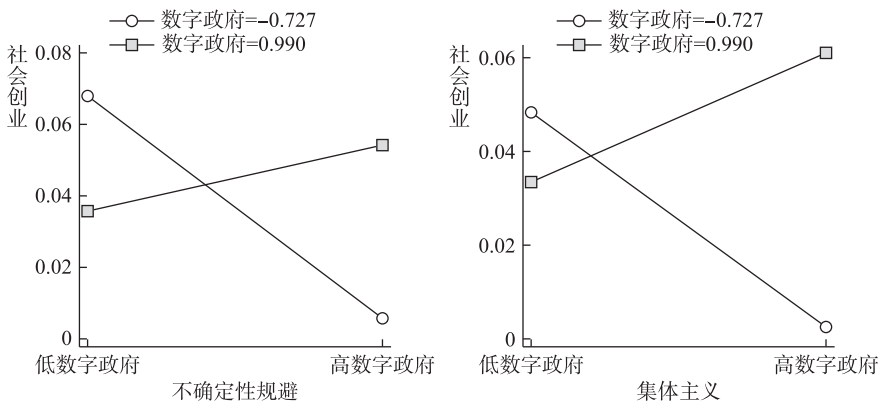


图 2 数字政府对不确定性规避、集体主义影响社会创业参与的调节效应

(二) 稳健性检验

1. 解释变量的替代检验

本研究选择与数字政府概念相近的电子政务来替代自变量测量,从概念上说,电子政务是数字政府发展的初级阶段,是指利用数字技术为公民提供信息和服务的配套措施,而数字政府更加注重利用数字基础设施实现民主参与、公共政策服务以及权力共享等目标 (Sahasranamam & Nandakumar, 2020)。表 4 显示了电子政务替代自变量之后的模型,结果表明电子政务对社会创业参与的主效应以及对于不确定性规避调节效应仍然成立 (模型 1、模型 3),电子政务对于集体主义的调节效应不显著,但方向一致 (模型 5)。

表 4 自变量替换后的多层 logit 回归模型

变量	社会创业参与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控制变量	省略					
电子政务	4.914*** (4.582)		2.671 (1.501)		5.057** (2.740)	1.917 (0.964)
不确定性规避		-0.850*** (-4.068)	-4.462*** (-3.517)			-4.582*** (-3.322)
数字政府× 不确定性规避			5.415** (3.103)			5.763** (3.080)
集体主义				-0.749** (-3.115)	-1.434 (-1.560)	0.237 (0.268)
数字政府× 集体主义					1.493 (1.031)	-0.905 (-0.659)
常数项 (个体)	-7.462*** (-10.188)	-4.525*** (-18.495)	-5.661*** (-4.924)	-4.583*** (-16.832)	-7.770*** (-6.484)	-5.209*** (-3.984)
常数项 (国家)	1.039*** (3.878)	1.520** (3.091)	1.083** (3.080)	1.869** (3.123)	1.426** (3.085)	0.971** (3.070)
N	144416	103269	103269	103269	103269	103269

注: *表示 $p < 0.10$,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01$ 。

2. 被解释变量的替代检验

替换的因变量选用的是 GEM 社会创业专题调查中的“参与到运营性的社会创业”题项,为避免样本选择偏差,将“参与到运营性的社会创业”与“参与

新创的社会创业”两题的总和（即参与所有类型的社会创业）作为因变量的替代变量进行检验（表5）。结果表明，数字政府对社会创业的主效应以及对集体主义和不确定性规避之于社会创业作用的调节效应仍然显著（模型1、模型3、模型5）。

表5 因变量替换后的logit回归模型

变量	社会创业参与（全部类型）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控制变量	省略					
数字政府	0.258 ⁺ (1.905)		0.103 (0.645)		0.254 ⁺ (1.793)	0.162 (1.106)
不确定性规避		-0.384 ^{***} (-3.456)	-0.330 ^{**} (-2.973)			-0.201 ⁺ (-1.713)
数字政府× 不确定性规避			0.339 [*] (2.126)			0.046 (0.253)
集体主义				-0.350 ^{**} (-2.850)	-0.330 ^{**} (-3.178)	-0.218 ⁺ (-1.817)
数字政府× 集体主义					0.462 ^{***} (3.324)	0.397 [*] (2.332)
常数项（个体）	-3.478 ^{***} (-27.710)	-3.629 ^{***} (-27.502)	-3.521 ^{***} (-26.231)	-3.651 ^{***} (-26.245)	-3.627 ^{***} (-30.577)	-3.625 ^{***} (-28.488)
常数项（国家）	0.602 ^{***} (4.672)	0.464 ^{***} (3.820)	0.405 ^{***} (3.814)	0.509 ^{***} (3.814)	0.357 ^{***} (3.808)	0.326 ^{***} (3.809)
N	142394	103269	103269	103269	103269	103269

注：⁺表示 $p < 0.10$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01$ 。

3. 更换模型检验

除上述稳健性检验外，还使用了普通logistics（逻辑斯蒂）回归模型进行验证（表6）。结果发现，数字政府对社会创业参与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模型1），数字政府与不确定性规避、集体主义的交互项系数分别在5%和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模型3、模型5），这与前文多层次模型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进一步验证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稳健性检验虽然未能刻画个体嵌套效应，但作为对多层次模型的补充，可以有效评估表2结果的可靠性。

表 6 Logit 回归模型

变量	社会创业参与（全部类型）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控制变量	省略					
数字政府	0.160*** (8.454)		0.167*** (4.951)		0.335*** (9.321)	0.305*** (7.825)
不确定性规避		-0.354*** (-19.228)	-0.299*** (-14.633)			-0.144*** (-5.690)
数字政府× 不确定性规避			0.425*** (12.954)			0.266*** (6.702)
集体主义				-0.395*** (-18.965)	-0.411*** (-18.981)	-0.278*** (-10.328)
数字政府× 集体主义					0.492*** (13.807)	0.288*** (6.785)
常数项	-3.952*** (-148.841)	-4.104*** (-123.475)	-4.063*** (-120.739)	-4.094*** (-124.024)	-4.239*** (-116.799)	-4.172*** (-112.854)
N	142394	103269	103269	103269	103269	103269

注：*** 表示 $p < 0.001$ 。

五 结论

社会创业不仅在全球范围内兴起，在中国也呈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社会创业逐步为众多利益相关者所认可，不仅得益于相关法律法规的改善，也受益于政府提供的各类政策支持和生态系统构建（Kerlin, 2017; McMullen, 2018）。具体而言，本研究关于数字政府与社会创业的关系有以下两点核心观点：首先，数字政府建设有助于机构职能重塑和流程再造，从而为公民服务提供便利，继而催生更多的社会创业。其次，作为稳定的文化构成要素，不确定性规避和集体主义对于社会创业的抑制将会长期存在，但数字政府将会通过赋权增能的方式削弱上述因素的不利影响——正如制度构型观所强调的，宏观制度的作用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多元的。因此，数字政府建设可以被认为是一种针对社会创业的改善型正式制度变革（王博、朱沅，2020；Bhatt et al., 2019）。进一步地，相关实证结果也为学者们化解社会创业研究中存在的“制度支持”和“制度空白”矛盾局面提供了新的思路（Li & Bosma, 2024），即学者们或许可以通

过考察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互相作用及其构型来重新思考上述矛盾。

虽然本研究主要基于国际比较视角来进行分析，但对中国这样地大物博、社会复杂的超大文明型国家来说，相关发现具有相当的政策意涵。除了生长路径存在自身独特性外，中国社会创业活动在治理逻辑、运行方式以及价值创造等方面与全球其他社会的创业活动并不存在根本性差异，甚至中国社会创业本身就可以被视为是相应制度实践在全球范围内扩散的产物。特别地，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不仅要看到数字政府建设本身的价值，更应该关注其对于文化要素的基础性重构作用。这是由于，相比于为社会创业活动提供直接的补助政策，政府自身变革是更为基础、根本的正式制度改进，有可能会产生大量更为有效的积极影响。

最后，尽管本研究的发现比较重视自上而下的制度对社会创业的影响，但是作为制度行动者的社会企业家，仍然可以获得一定的启发：那就是需要及时了解到外部制度变革，特别是政府自身变革所带来的各类机遇，以及上述变革之于社会创业活动合法性空间、资源状况等方面改善的潜在作用。在数智时代，真正的社会创业危机往往并不源于传统领域内的竞争者，而真正的机会也并不来源于确定的制度场域，而是源于不同（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相互影响和作用的缝隙和界面之间（Fumari，2014）。

参考文献

邓国胜等（2019）：《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行业调查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李健（2016）：《政府如何促进社会企业发展？——来自新加坡的经验》，《经济体制改革》，第5期。

刘振、杨俊、张玉利（2015）：《社会创业研究——现状述评与未来趋势》，《科学与科学技术管理》，第6期。

刘志阳、许莉萍（2022）：《制度与社会创业：基于文献的整合框架》，《经济管理》，第1期。

刘志阳、庄欣荷（2018）：《社会创业定量研究：文献述评与研究框架》，《研究与发展管理》，第2期。

王博、朱沅（2020）：《制度改善速度与机会型创业的关系研究》，《管理世界》，第10期。

杨晶、李哲、康琪 (2020): 《数字化转型对国家创新体系的影响与对策研究》, 《研究与发展管理》, 第 6 期。

张晓、鲍静 (2018): 《数字政府即平台: 英国政府数字化转型战略研究及其启示》, 《中国行政管理》, 第 3 期。

Austin, J., Stevenson, H., & Wei-Skillern, J. (2006), "Social and Commercial Entrepreneurship: Same, Different, or Both?"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30 (1), pp. 1-22.

Bhatt, B., Qureshi, I., & Riaz, S. (2019),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in Non-munificent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and Implications for Institutional Work: Insights from China,"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54 (3), pp. 605-630.

Bosma, N., Schøtt, T., Terjesen, S. A., & Kew, P. (2016),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2015 to 2016: Special Topic Report on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vailable at SSRN 2786949.

Brieger, S. A., Bairo, A., Criaco, G., & Terjesen, S. A. (2021), "Entrepreneurs' Age,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Value Creation Goals: A Multi-country Study,"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57 (1), pp. 425-453.

Bruton, G. D., Ahlstrom, D., & Li, H. L. (2010), "Institutional Theory and Entrepreneurship: Where Are We Now and Where Do We Need to Move in the Future?"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34 (3), pp. 421-440.

Canestrino, R., Ćwiklicki, M., Magliocca, P., & Pawełek, B. (2020), "Understanding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 Cultural Perspective in Business Research,"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110, pp. 132-143.

Choi, D., & Park, J. (2021), "Local Government as a Catalyst for Promoting Social Enterprise,"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23 (5), pp. 665-686.

Choi, D., Berry, F. S., & Ghadimi, A. (2020), "Policy Design and Achieving Social Outcom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ocial Enterprise Policy,"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80 (3), pp. 494-505.

Desa, G., & Basu, S. (2013), "Optimization or Bricolage? Overcoming Resource Constraints in Global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7 (1), pp. 26-49.

Epstein, D., Newhart, M., & Vernon, R. (2014), "Not by Technology Alone: The 'Analog' Aspects of Online Public Engagement in Policymaking,"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31, pp. 337-344.

Estrin, S., & Mickiewicz, T. (2012), "Shadow Economy and Entrepreneurial Entry,"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6 (4), pp. 559-578.

Estrin, S., Mickiewicz, T., & Stephan, U. (2016), "Human Capital in Social and Commercial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31 (4), pp. 449-467.

Fogel, K., Hawk, A., Morck, R., & Yeung, B. (2006), "Institutional Obstacles

- to Entrepreneurship,” *Oxford Handbook of Entrepreneurship*,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reytag, A. , & Thurik, R. (2007), “Entrepreneurship and Its Determinants in a Cross-country Setting,”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17 (2) , pp. 117–131.
- Fukuyama, F. (2001), “Social Capital, Civil Society and Development,” *Third World Quarterly* 22 (1) , pp. 7–20.
- Furnari, S. (2014), “Interstitial Spaces: Microinteraction Settings and the Genesis of New Practices between Institutional Field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9 (4) , pp. 439–462.
- Ghatak, A. , Brandenbourger, M. , Van Wezel, J. , & Coulais, C. (2020), “Observation of Non-Hermitian Topology and Its Bulk-edge Correspondence in an Active Mechanical Metamaterial,”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7 (47) , pp. 29561–29568.
- Gorodnichenko, Y. , & Roland, G. (2017), “Culture, Institutions,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9 (3) , pp. 402–416.
- Guo, C. , & Bielefeld, W. (2014),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n Evidence-based Approach to Creating Social Value*,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 Gupta, P. , Chauhan, S. , Paul, J. , & Jaiswal, M. P. (2020),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A Review and Future Research Agenda,”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113, pp. 209–229.
- He, T. , Liu, M. J. , Phang, C. W. , & Luo, J. (2022), “Toward Social Enterprise Sustainability: The Role of Digital Hybridity,”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175, p. 121360.
- Hechavarría, D. (2016), “The Impact of Culture on National Prevalence Rates of Social and Commercial Entrepreneurship,”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nd Management Journal* 12 (4) , pp. 1025–1052.
- Hechavarría, D. M. , Terjesen, S. A. , Ingram, A. E. , Renko, M. , Justo, R. , & E-lam, A. (2017), “Taking Care of Business: The Impact of Culture and Gender on Entrepreneurs’ Blended Value Creation Goals,”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48 (1) , pp. 225–257.
- Hoetker, G. (2007), “The Use of Logit and Probit Models in Strategic Management Research: Critical Issu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8 (4) , pp. 331–343.
- Hofmann, D. A. (1997), “An Overview of the Logic and Rationale of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s,” *Journal of Management* 23 (6) , pp. 723–744.
- Hofstede, G. (1980), “Culture and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Management & Organization* 10 (4) , pp. 15–41.
- Hofstede, G. , Garibaldi de Hilal, A. V. , Malvezzi, S. , Tanure, B. , & Vinken, H. (2010), “Comparing Regional Cultures within a Country: Lessons from Brazil,”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41 (3) , pp. 336–352.
- House, R. J. , Hanges, P. J. , Javidan, M. , Dorfman, P. W. , & Gupta, V. , eds. , (2004), *Culture,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s: The GLOBE Study of 62 Societies*, Thou-

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Hox, J. J. , Maas, C. J. , & Brinkhuis, M. J. (2010), “The Effect of Estimation Method and Sample Size in Multilevel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tatistica Neerlandica* 64 (2), pp. 157–170.

Jang, S. H. , & Lee, K. T. (2017), “The Effects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nd Social Capital on Enterprises Performance,” *Journal of the Korean Entrepreneurship Society* 12 (2), pp. 256–277.

Kerlin, J. A. (2010),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Global Emergence of Social Enterprise,” *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21 (2), pp. 162–179.

Kerlin, J. A. , ed. , (2017), *Shaping Social Enterprise: Understanding Institutional Context and Influence*, Leeds: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 Y. , & Zahra, S. A. (2012), “Formal Institutions, Culture, and Venture Capital Activity: A Cross-country Analysis,”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7 (1), pp. 95–111.

Li, X. , & Bosma, N. (2024), “Institutional Theory in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 Review and Consideration of Ethics,”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forthcoming.

Liu, Z. , Xu, L. , & Jia, F. , et al. (2024), “Pro-market Institutions and the Degree of Hybridity in Startup Social Ventures: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Organizational Activities,” *British Journal of Management* 35, pp. 2032–2046.

Lee, J. , Kim, H. J. , Ahn, M. (2011), “The Willingness of E-Government Service Adoption by Business Users: The Role of Offline Service Quality and Trust in Technology,”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28, pp. 222–230.

Mair, J. , & Marti, I. (2009), “Entrepreneurship in and around Institutional Voids: A Case Study from Bangladesh,”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4 (5), pp. 419–435.

McLoughlin, I. , & Wilson, R. (2013), *Digital Government at Work: A Social Informatics Perspectiv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cMullen, J. S. (2018), “Organizational Hybrids as Biological Hybrids: Insights for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Enterprise and the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33 (5), pp. 575–590.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 European Union (2017), *Boosting Social Enterprise Development: Good Practice Compendium*, Paris: OECD Publishing.

Pathak, S. , & Muralidharan, E. (2016), “Informal Institutions and Their Comparative Influences on Social and Commercial Entrepreneurship: The Role of In-group Collectivism and Interpersonal Trust,”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54, pp. 168–188.

Porcher, S. (2021), “Culture and 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81 (2), pp. 333–343.

Saebi, T. , Foss, N. J. , & Linder, S. (2019),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Past Achievements and Future Promises,” *Journal of Management* 45 (1), pp. 70–95.

Sahasranamam, S. , & Nandakumar, M. K. (2020), “Individual Capital and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Role of Formal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107, pp. 104–117.

Schmutzler, J. , Andonova, V. , & Diaz-Serrano, L. (2019), “How Context Shapes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as a Driver of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A Multilevel Approach,”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43 (5), pp. 880–920.

Scott, W. R. (2005), “Institutional Theory: Contributing to a Theoretical Research Program,” *Great Minds in Management: The Process of Theory Develop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460–484.

Shockley, G. E. , & Frank, P. M. (2011), “Schumpeter, Kirzner, and the Field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2 (1), pp. 6–26.

Short, J. C. , Moss, T. W. , & Lumpkin, G. T. (2009), “Research in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Past Contributions and Future Opportunities,”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3 (2), pp. 161–194.

Stephan, U. , & Drencheva, A. (2017), “The Person in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 Systematic Review of Research on the Social Entrepreneurial Personality,” *The Wiley Handbook of Entrepreneurship*, New York: Wiley, pp. 205–229.

Stephan, U. , & Uhlaner, L. M. (2010), “Performance-based vs Socially Supportive Culture: A Cross-national Study of Descriptive Norms and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41 (8), pp. 1347–1364.

Stephan, U. , Uhlaner, L. M. , & Stride, C. (2014),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The Role of Institutional Voids, Institutional Support, and Institutional Configurat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46 (3), pp. 308–331.

Sud, M. , VanSandt, C. V. , & Baugous, A. M. (2009),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The Role of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85 (1), pp. 201–216.

Thai, M. T. T. , & Turkina, E. (2014), “Macro-level Determinants of Formal Entrepreneurship Versus Informal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9 (4), pp. 490–510.

Wennekers, S. , Thurik, R. , Stel, A. V. , & Noorderhaven, N. (2010), “Uncertainty Avoidance and the Rate of Business Ownership across 21 OECD Countries, 1976–2004,” *In Entrepreneurship and Culture*, Berlin: Springer, pp. 271–299.

Williamson, I. O. (2000), “Employer Legitimacy and Recruitment Success in Small Businesses,”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5 (1), pp. 27–42.

Woo, C. , & Jung, H. (2022), “Exploring the Regional Determinants of the Emergence of Social Enterprises in South Korea: An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 Perspective,”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08997640221110211, online first.

World Bank (2016),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6: Digital Dividends*, Paris: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Yan, S. , Ferraro, F. , & Almandoz, J. (2018), “The Rise of 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ment Funds: The Paradoxical Role of the Financial Logic,”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64 (2), pp. 466-501.

Zahra, S. A. , Gedajlovic, E. , Neubaum, D. O. , & Shulman, J. M. (2009), “A Typology of Social Entrepreneurs: Motives, Search Processes and Ethical Challenges,”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4 (5), pp. 519-532.

Zhao, E. Y. , & Lounsbury, M. (2016), “An Institutional Logics Approach to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Market Logic, Religious Diversity, and Resource Acquisition by Microfinance Organizations,”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31 (6), pp. 643-662.

责任编辑：罗文恩

NP

数字政府驱动全球社会创业：
制度分析与经验证据

Digital Government Boosts Global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n 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Song Chengcheng Zhao Chenfang Kang Jiaojiao Lyv Mengli

[**Abstract**] Digital government is more than self-reform of government, it also means the reshape of interfaces between government and society, as well as economy. We may explain the social effects of digital government itself and its influences on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The empirical results of global data show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government in one country will enhance the level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nd will also contributes to the latter by moderating the nega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raditional culture (collectivism, avoidance of uncertainty) and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as the key actor in producing and shaping formal institutions, government will affect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by shaping infrastructures. The social entrepreneurs should not only focus on the supporting polices, but also consider the quality of local digital government construction.

[**Keywords**] Cross-country Comparison; Multi-level Model;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Role of Government; Institutional Configuration

Research of Social Enterprise Legislation under Comparative Law Perspective

Tao Pu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emergence of innovative models of social enterprises, there are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between countries in terms of the nature of organization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legal frameworks. Due to the multiplicity in the veins and modes of extraterritorial legislation, this article compared and analyzed further based on the tracing of the diversified legal framework of social enterprises especially from the definition and identifiability of social enterprises to the main normative dimensions of the

N^p

Abstracts

315